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从同舟共济到分道扬镳
——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爱情与自由之辩

曹艳红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青年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探索爱情与自由的新关系,这其中存在着不同趋向:一方面,大量作家抒写了为爱情而战的决心,无论是追寻恋爱的自由还是追寻自由的恋爱,总之都是把爱情与自由同构;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家开始探讨自由对爱情的破坏,或爱情对自由的束缚。文章阐述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表现出的这几种趋向,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爱情;自由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1-0074-07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爱情主题小说的高潮,很多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点,认为众多的青年作家借此表达了对自由的追寻。如李欧梵就指出:“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1]这里的自由指的都是积极自由,就是“自主、隐私、自我发展”的自由。实际上,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的部分知识青年已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获得了最低限度的自由,这就是不再受到“公众”干预和妨碍的“私人”自由,但他们却尚未能够获得“决定他的生活道路,从而实现他的潜能,即达到他认为应当达到的最佳状态”[2]的自由,陷于自由却不自我的境况下。他们也试图在爱情中获得更加完善的自由。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爱情是不是能够完全替换自由。何谓因何谓果?追求什么放弃什么?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里有着不同的表现。这种对爱情与自由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可以看到作家对爱情与自由关系的深层思考。

一、为爱情而战

在20世纪20年代小说的爱情主题热中,“爱情”首先成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成为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说“宗教表明了人寻求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所作出的努力”[3],那么爱情就是这些青年们的一种宗教性的信仰。《情爱论》就宣称爱情“在个人自由这种每个人都直接体验到的种种感受的综合体中,爱情有很大作用”。“爱情,这是对意识的屈从、对私有制、对阶级专制、对人剥削人、对社会压迫的否定。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道主义的宣言书,是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宣言书。”[4]爱情承载着人们个人自我发展完善的希望,成为达到个人自由之境的最佳道路。作家们对当时人的处境的理解存在两个侧重点,一是认为传统社会难解的束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二是认为新文化中尚未完满的自由更为直接、深切,这两个侧重点规定了两种追寻爱情的不同起点。这

收稿日期:2007-11-26

作者简介:曹艳红(1977—),女,江苏常熟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

两种不同的起点实际上也规定了对爱情与自由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爱情对主人公来说首先意味着追求自由还是逃避孤独，这就区分出了两类不同的追寻爱情模式。两类模式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了为爱情而战。

（一）自由恋爱的追寻

20 世纪 20 年代爱情主题小说中，重视传统社会束缚的作家，承继了五四爱情主题小说的足迹，把爱情作为反抗传统社会、争取个人自由的武器，用爱情和传统社会相抗衡。爱情所代言的自由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个人自主选择的自由，这是针对爱情所面临的外部条件来说的；第二是爱情领域内的个人自由，这是针对爱情内部的因素来说的。

用爱情代言个人选择自由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说中非常普遍。冯沅君在《隔绝》说得很清楚："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5]4《旅行》、《隔绝》、《隔绝之后》系列作品集中表现了爱情与"意志自由"的同构性。冯沅君特别设置了男女主人公的身份，男主人公是一个被旧式婚姻捆绑的男子，女主人公是一个有旧式婚约的女子。当两人结成同盟之后，面对社会，遭致了传统社会的一致反对。正是在母亲为代表的旧传统的反对、压制之下，爱情中自由意志才进一步得到凸现。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先后的自杀并不是屈服而是反抗，这正是两人爱情的转折点。只有在死的庄严肃穆气氛中，爱的勇敢和执著才明确表现出来，男主人公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表露对女主人公的爱情，而他们的爱才能获得承认。爱情与自由正是同一个意思。

在这种自由之外，获得爱情之后的个人有没有重新选择爱人的自由，逐渐成为作家们思考的一个中心。秉承精神恋爱观的作家一开始无法不把这种重新的选择看作一种罪恶。很多作品都谴责过这种不专一的爱，但是也有作家更不能释怀的是"意志自由"的问题。以冯沅君为例，她曾经在《林先生的信》中谴责过男子的移情别恋，但在《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潜悼》中，移情别恋、脚踩两只船的男子成了作家同情的对象。男子的痛苦正在于忠实自己的感情却又无法实现，忠实原来的爱人又已经违反了爱情道德。这种个性的自由要求和忠实的爱情道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借了女子的来信说"双方的绝对自由，是爱情的重要属性"[5]9，已经开始强调爱情内部的个人自由问题，而且指出这种爱情的转移并不是败坏道德的表现。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现代爱情的内涵：爱情应该是自由个体心灵的真正契合。

更多的作家没有冯沅君式的矛盾和挣扎，他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创作的众多小说都宣扬爱情内部也有个人自由。滕固的《银杏之果》、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叶鼎洛的《未亡人》、张资平的《苔莉》、叶灵凤《内疚》和《女娲氏之遗孽》等作品中，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移情别恋，似乎没有心灵上过重的负担。以叶灵凤的这两篇作品为例，女主人公与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合，但这种爱情里面显然还隐藏着某些缺憾，这使得她们与丈夫的感情经不住时间的摧残而枯萎，而此时她们都在与邻家青年在交往中相爱了，正是这种新的爱情让她们获得了缺憾的满足。《内疚》中的女主人公向情人坦白："我现在所奉给你的，是完完全全精神上的一个整个。"[6]这"一个整个"就是在以往的爱情婚姻当中没有获得满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她已经完全不爱丈夫了，她与情人的爱才是她一直追求的东西，这就是充满诗意和激情的真正爱情。爱情有真假，也有消长，那么自然有权选择新的爱人。主人公们为了获得真正的爱情，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 N 次的自由选择都是合理的。实际上这些作家们还是维护了爱情的专一与神圣。

章衣萍在这个基础上提倡了更先锋的爱情道德，在这种爱情道德中，自由是爱情的核心，一个人有同时爱上几个人的自由。1923 年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以反婚姻制为基础和核心的"情人制"和"爱情定则"理论，引发了一场"爱情定则"论战。这次论战产生了一定影响，章衣萍就

很信仰这种思想,1924年他听说汪静之和爱人同居之后就写了杂文《不要组织家庭》,劝告两人不要组织家庭,“我是根本反对什么家庭的,就这样亲亲切切地恋爱,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就这样浪漫地愉快地度过这几十年的有限人生,也尽可满足了。”[7]《桃色的衣裳》就是他的这种理念的形象化。作家让女主人公菊华先后与两个男子相爱,她又不想放弃其中任何一个男子,这样就处在痛苦之中。她积极寻找出路,并且从她信仰的爱情理想中得到启发。她的爱情理想是建立在反婚姻制的基础上的,让相爱的人像朋友一样,经济独立,共同生活。在这种理想中,增添一个人也并不会妨碍爱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也成为她试图摆脱困境的一线光明。这种并不建立婚姻家庭的爱情理想实际上就触及到青年对个人绝对自由的一种追寻。虽然作家明确意识到这种自由又是不现实的,在之后的作品《给璐子的信》中否定了这种新生活理想,但是作为追求爱情中的绝对自由这种理念的提倡,这种探索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明了对爱情中个人自由的肯定,爱情与自由仍然应该是同构的。

(二)自由恋爱的追寻

当个人有了部分自由之后,孤独就产生了。自由给了个人实现自我的机会,但是当人开始面对这种失去束缚的状态,往往感到的是一种失重的痛苦,人生变得没有意义。人必须逃避这种孤独所带来的分离感,不得不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设定新的人生模式,赋予人生以独特意义。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人类分离的意识,没有爱的重新结合——就是羞耻心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焦虑的根源。”[8]238郁达夫、庐隐等的小说正是试图用爱情承担逃避孤独、实现自我的任务。

以郁达夫的创作为例,《沉沦》一开始就指出主人公对爱情的追寻起源于孤独感,“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确立了全篇的基调。这里提出的是一种个人的孤独感,具有一种哲学意味。这在其他作品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和阐释。《胃病》里主人公感叹道:“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人从母胎里生下来,仍复不得不一个人回到泥土里。我的旅途上的同伴,终竟是寻不着的了。”[9]70这种感叹在郁达夫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唯一剧作中又一次得到强调。这个剧作开始名为《孤独的悲哀》,后来收入《达夫全集》第三卷时,改题名为《孤独》,无论怎么改,都没有脱离“孤独”这个核心。作品中历经沧桑的陈二老有这样两段话:“我们人类,本是孤独的,一个人生下地来,就不得不一个人归地下去,孤独便是我们的命运呀。”“……可是……难道我们人类应该是互相隔绝,不得不与孤独同入墓下的么?啊啊,人类的运命啊,老后的余生啊,我觉得世间万物,都带着这夜间的灰色似的。……”[9]444-445实际上这也是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存矛盾的核心,他一切的行为就是为了逃避这种孤独,而爱情显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沉沦》中主人公的忧郁症正是孤独感的强烈表现。这种自觉孤冷的忧郁症从何而来,必须追溯到主人公出国留学之前的状况。那时他是一个富有反抗意识的少年,父亲早亡,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似乎受传统礼教的压抑比较少,在学校里他一次又一次为了反抗专制而斗争,一次又一次遭到压制。由于学校的不如意,他一直在家自学,而忧郁病的根苗正是在此时养成的。可见,这种孤独感就是他在有一定自由的空间中形成的。留学之后增添了异国他乡的因素,在脱离传统社会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它的保护,孤独感就更加强烈了。他曾经试图用爱情来补救这种孤独,决定到N市这个日本盛产美人的地方去进高等学校,可是希望落空。为了排遣寂寞,他首先选择的是回归自然,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方式渐渐不奏效,青春期的性苦闷使他最终把逃避孤独的方式指向了爱情。这里的主人公已经不是徘徊在家门内外的冯沅君作品中的青年了,他们已经走出家门,家庭的束缚已不再存在,甚至旧传统的社会势力也不复存在。但是这种无束缚的状态只是给了他无法消解的孤独。他希望获得体谅和安慰,从而获得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9]26。由此可见,他对爱情的渴求起源于因自由而产生的孤独,希望用爱情实现孤独个体与他

人的联合，超越自己单调的生命，这是个性发展实现自我的要求。但是他的爱情理想一直没能实现。他虽然最后谴责自己的堕落，但他主要是因为自己求不到爱情所要忍受的“干燥的生涯”而自杀。作品把爱情失败归因于弱国子民在强国受歧视的生存状况。这种弱国子民的身份使他无法获得爱情这一解决生存矛盾的途径，这是一种更大的不自由，但是又不是个人通过反抗能够获得的，而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建设。呼唤祖国的强大正是希望祖国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20 世纪 20 年代的创作中，郁达夫一直明显延续着这种趋向：逃离零余者的孤独感，追寻爱情所带来的个人自我完善。作品中的爱情要求往往伴随着对孤独的痛苦体会，而爱情不仅是带来个人发展的途径，也成为了个人自我完善的最好方式。

二、为爱情所困

爱情自由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说中具有一种崇高的意味，仿佛是开启极乐世界的钥匙。但是问题在于，爱情自由的获得是不是一定能带领主人公走向幸福？因为爱情虽然代言了自由，但是自由毕竟不等于爱情。个人自由是不是一定能够保证爱情的获得？已经产生的爱情是不是有利于达到双方的个人自由呢？在追寻爱情的途径中，往往有人迷失在爱情里，也有人徘徊在爱情的道路上乐不思蜀，忘记了自由的深刻含义。作家们对这一切作了描绘，在探索爱情的过程中对自由与爱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反思。

（一）自由的隐忧

既然爱情与个人自由存在同构性，那么个人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又如何呢？庐隐这位敏感的女作家首先看到了自由背后的隐忧。《沦落》、《兰田忏悔录》、《父亲》等都指出：对于毫无社会经验的少女来说，恋爱的自由被扭曲、被丑化，沦落为男子随意占有或者是抛弃女子的自由，而且这种占有还不仅仅是对女子个人的占有，还有如《兰田忏悔录》、《父亲》中借爱情婚姻对金钱、财产的占有。自由成了别人利用来伤害女子又不用承担责任的工具，却没有给信奉者带来真正的爱情。如果说《沦落》中的松文、《父亲》中的继母等还只是一个盲目的自由恋爱的信奉者，《兰田忏悔录》中的兰田却已经是一位清醒的新女性了，但是她们的命运却没有很大的差别。兰田从小家庭不幸，为了逃避不自由的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自觉不但是为自己个人谋幸福，也是为了同样遭受家庭专制的女性作先锋。她积极投入社会运动，气概干云。可是饱受着寂寞侵袭的她完全不能辨别他人假意输来的温情，与何仁定了婚。但当她失去金钱和地位，又一次生病的时候，爱人和朋友都抛弃了她。爱情自由中的贞操只局限于女性，男性却并不受到这种约束，新的爱情观受到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被扭曲了。自由恋爱如果缺乏宽容的社会环境，对于信奉自由恋爱的女性只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张资平的作品则表现了自由恋爱中的欺骗与背叛。爱情中的个人自由成为可以利用的漏洞，成为不贞者时时越轨的方便之门。《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梅岭之春》中的保瑛、《苔莉》中的苔莉、《最后的幸福》中的美瑛都遭遇到如此局面。在《苔莉》中，苔莉本来是一位追求自由的新女性，与人自由恋爱，却发现情人用情不专而与之绝交，又与白国淳自由恋爱结婚，却直至女儿几岁了才知道丈夫不仅在老家有妻室，在自己生活的同一个城市里还有其他情人。一个经过了个性解放洗礼的新女性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她暗中寻找新的希望，选定了谢克欧作为自己的新爱人，试图由此寻找真正的忠贞爱情，寻找一个自始至终真正爱自己一个人的伴侣。苔莉和克欧相爱之后，他们的爱情不能容于世俗，克欧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留恋现存社会秩序，希望与旧势力相妥协，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虽然一方面与苔莉相爱，另一方面却暗渡陈仓，和刘小姐定了婚约，铺好了回归传统社会之路，苔莉又一次被背叛了。最终在她的强力维护下，两人出走跳海自杀。可见，

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享受它的美妙时必须付出代价。

在这个时期,叶灵凤的《菊子夫人》、《爱的战士》直接把借自由恋爱之名玩弄少女感情的人刻画成流氓无赖的形象。《爱的战士》中的小萍就是这样一个恶男。在他的自白中,以一种自我标榜的姿态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经历,对女子的感受满不在乎,他认为这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才是"个性"的体现,"——不知道厌倦的人是没有审择性的。这样的人是没有个性的,是不配有他自己的";而自己不停地抛弃和选择新的女子才是证明了自己的个性和"聪明","爱是不灭的,但这并没有说你的爱人是不灭的。"[10] 他的"聪明"就在于用花言巧语获得了女子的真挚的感情,又用花言巧语在享受了这种感情后"及时"抛弃了这名女子。他打着如意算盘,自鸣得意地筹划着一切,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竟然成了这种无赖的武器。一贯注重刻画女子心理的叶灵凤在这里注意到了庐隐同样注意的事实,从反面的角度揭示这种自由被滥用的状态。

(二)爱情的隐忧

爱情对郁达夫、庐隐等作家来说,是逃避孤独的最佳途径,但是爱情实现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孤独。即使沉醉在爱情中,清醒的个人主义者逃不开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庐隐《前尘》中的女主人公就在自由恋爱过程中体会到了个人的孤独。即使沉迷恋海,也无法不让女子感到爱情中个人作为独立个体所感受到的孤独。虽然个人可以用恋爱获得联合、逃避孤独,可是由于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永远难以排解这种孤独。这就是人生存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爱情并不能完全避免孤独的产生和消灭,实际上庐隐也没有在作品中指出这种消灭的方式,只是用结婚来预示恋爱的成功。但结婚以后又如何呢?庐隐的《前尘》、《胜利以后》等篇从女子的角度观察新式婚姻的现状。女主人公不受传统约束,自由投入爱情,弥补了自己无爱的枯燥人生,可是爱情胜利之后并没有实现她们的梦想。当她们终于穿过曲折的小径,带着满身伤痕攀上顶峰时,却发现前面并没有幻美的仙境,仍旧是一座需要努力攀爬的山峰。恋爱苦多乐少,可结婚依旧如是。恋爱之时还有憧憬,认为"只要有一个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理想生活",结婚的实现是憧憬落下云端成为了现实,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牵制,不再有超越的乐趣了。"回顾前尘,厌烦现在,和恐惧将来的心理,"[11] 就是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生活的总结。结婚生活让女子陷入了新式家庭,可在新式家庭中一样要"善持家政,好和夫婿",打理家庭的日常琐事,以前的梦想——服务社会、经济独立等都要抛弃,使她们忧心。她们的痛苦就在于想借爱情完成一切,既抱拥自由又逃避孤独,而现实恰恰相反,婚后的不自由和孤独交织起来冲击她们的心。如何调适这一切继续爱情婚姻之路正是她们所真心想要探索和实践的问题。《何处是归程》更是讨论了女子的两种出路——结婚生子和不结婚为事业奋斗,两者都走向幻灭。爱情已经不能充任获得真正个性自我、独立人格的途径,究竟应该如何面对现实,获得理想的完满,那就不是爱情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郁达夫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中同样一直试图在爱情中逃避孤独、实现自我的完善,他的作品中,给主人公的定位是"如果有了爱情,我就可以实现自我了",因为主人公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假定,所以痛苦不堪。《迷羊》写作的时候,郁达夫终于获得了自己苦苦追寻的爱情,在经历了一些反覆之后,他和王映霞的感情终于确定了。此时他自身终于实现了这个假定,但是,正如沈从文所总结的,郁达夫并不擅长歌颂生活,他"以忏悔的情绪写作了这本书",表明了他对"The age of innocence"也就是"天真的时代"的总结。《迷羊》中,男主人公王介成主要因为性压抑而导致了"脑病",因此到A城养病,在自然风光的陶冶下,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这时,他偶遇女戏子谢月英,好奇之下跟踪了她们,从此爱上了看戏,迷上了谢月英。这还仅止于《沉沦》的程度。然后他在熟客的带领下与谢月英相识,经过兴奋、猜疑、生病等过程,向她表白了爱意,也获得了她同样的表白。出院后两人约定了私奔。这是郁达夫的男主人公第一次真正得到了爱情。成熟的爱"是在保

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性条件下的融合”[8]246－247，但是王介成完全把个人生存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与谢月英的爱情中，在爱情中王介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的自由。谢月英却不是如此。她的沉迷只是一时的，很快她就转入到现实生活中，她有自己的追求，要求继续她的舞台生涯。王介成完全把这种要求看作是她放纵个性的体现，要求在更多的男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吸引力。因为妒忌她在别的男人之前的表现，他更加陷入了肉欲的生活中，想要进一步占有她。谢月英因为自己个人得不到尊重而想要投入爱情获得个人自我，可是在爱情中她的个性受到限制，她又没有办法在对方的依附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最终选择了离开重新获得自由。《迷羊》表明作家认识到了消除孤独情绪并不是爱情的唯一目的，爱情与自由的同构可能导致对自由的损害，个人并不能寄希望爱情来解决一切，从而他转入了“怀疑的时代”，不再借助爱情来解决生存问题。

三、结语

确实，把爱情与自由看作同一回事的趋向，在新文学的创作初期非常普遍。这种理念的传达往往是在没有获得爱情之前表现出对爱情的企望，但是一旦真正获得了爱情，作家们的思考就开始深入，探讨了爱情与自由互相损害的问题。以前的假定既然被解构，那么什么才是解决生存矛盾的关键呢？一方面我们看到，1928 年以后，作家们的创作中“革命加恋爱”作品开始风靡一时，但很快衰落下去。作为“革命加恋爱”公式化的始作俑者，蒋光慈创作这类小说的原意是冲击当时流行的恋爱小说。洪灵菲的《流亡》、《前线》，叶永蓁的《小小十年》，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茅盾的《蚀》，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等作品，都强调爱情与革命相辅相成，爱情并不妨碍革命，甚至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爱情的权利。正如鲁迅对《小小十年》的评价：“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势。”[12]这时候，个人主义者尚未失去自我。随后，革命逐渐取得了优势，集体主义开始压抑个人主义，“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为了国家能够“自由”，就要牺牲个人“自由”[13]。很多知识分子浪漫地把革命看成了获得进一步个人自由最好的方式，爱情题材逐渐被排斥。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像郁达夫这样爱情成功而建立了新家庭的作家个人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出走。1930 年，结婚才两年多的郁达夫因为王映霞对他的小小管制——实际上也是为他的身体着想而劝他少喝一点酒，他第一次出走，伤了王映霞的感情，之后物质方面的补偿弥补不了感情的伤口。王映霞意识到这是由郁达夫在复杂的环境中养成的苦闷、颓废的性格所决定的，他“不习惯有规律的家庭生活”，有时候“想恢复一下幻想”，因此而独自出走；其实也不会走远，不久就会自己回来[14]。这其实也说出了郁达夫的心态，向往着家庭的温暖，但是又不能被家庭生活束缚，想要用爱情婚姻所构成的家庭来驱散个人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却又被自由的幻想所牵制，永远不能停歇对自由的渴望，像那个穿着拖鞋出走的保尔·魏尔伦一样，在漂泊中追寻人生，这表明了一个执著于自由的个人的生存困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1] 李欧梵. 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 年[M]//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34.

[2] 史蒂文·卢克斯. 个人主义[M]. 阎克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19.

[3] E·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凯详，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3.

[4] 基·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52－454.

[5] 冯沅君. 冯沅君创作译文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6] 叶灵凤. 叶灵凤名作:处女的梦[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138.
[7] 章衣萍. 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99.
[8] 埃·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9] 郁达夫. 郁达夫小说全编:上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10] 叶灵凤. 叶灵凤文集第一卷:永久的女性[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88.
[11] 庐 隐. 庐隐选集:上册[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285.
[12] 鲁 迅. 小引[M]// 叶永蓁. 小小十年. 上海:春潮书局,1929:1-2.
[1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283.
[14] 王映霞. 半生自述[M]// 赵李红. 郁达夫自叙.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303.

A Discussion on Love and Freedom in the 1920s' Fiction

CAO Yan-hong
(*Chinese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 lot of young writers tried to find out the new relationship about love and freedom in their fictions in the 1920s. There were different trends in their exploration. On the one hand, many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determination of fighting for love by writing the search for the freedom of love and the one for the free love. No matter which search they wrote, they all identified love with freedom. On the other hand, some writers began to probe into the destruction of love by freedom and the fetters of love. The author wants to point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riters' pursuit by setting forth these trends particularly.

Key Words: in the 1920s; love; freedom